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外国文艺思潮



厦门大学吕振万书籍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赖干坚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赖干坚 著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外国文艺思潮

厦门大学吕振万书籍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艺思潮

赖干坚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厦门水产学院印刷厂印刷

厂址:厦门集美嘉庚路 10 号 邮编:36102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0.375 印张 2 插页 251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80534-845-6

I·740 定价: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吕振萬先生书籍出版基金

“厦门大学吕振萬先生书籍出版基金”是由吕振萬先生捐资 100 万港币创立的，用于资助厦门大学教师出版他们的专著及优秀教材。

吕振萬先生 1924 年出生，祖籍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1945 年毕业于中国朝阳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与法学。毕业后赴海外开拓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他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在经济学及工商管理学学术上具有独特的理论见解，体现了现代大企业的先进管理思想，立有专著，发表了不少很有深度的文章。被聘为厦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吕振萬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率先回国投资，先后在国内创办了 30 家现代化企业和成片的综合开发区，潘龙开发区的成功就是个典范。

吕振萬先生不仅是一位兼有现代化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艺术的企业家，而且不忘造福社会。他很重视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但他更重视人才和关心教育事业，在福建省捐资近一亿港币，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外国文艺思潮

赖干坚 著

内 容 简 介

本书把外国文艺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观点出发，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嬗变历程中富于代表性的流派、作家、作品和文学观加以论析，因此全书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较鲜明地勾勒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突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嬗变与中西文化撞击、交融的关系，论证了中国文学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吸收外国文学的有益成分这一基本观点。本书视野开阔，立论稳妥，角度新颖，在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能予人以启迪。

目 录

上 编

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艺思潮

- 引 言.....(3)
-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化内涵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渗透.....(4)
- 二、“五四”新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15)
- 三、“五四”新文学与欧洲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思潮.....(38)
- 四、“五四”新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60)
- 五、鲁迅小说的理性批判力度与鲁迅对外国文艺思潮的接纳.....(90)
- 六、丁玲的创作与现实主义流变.....(118)

下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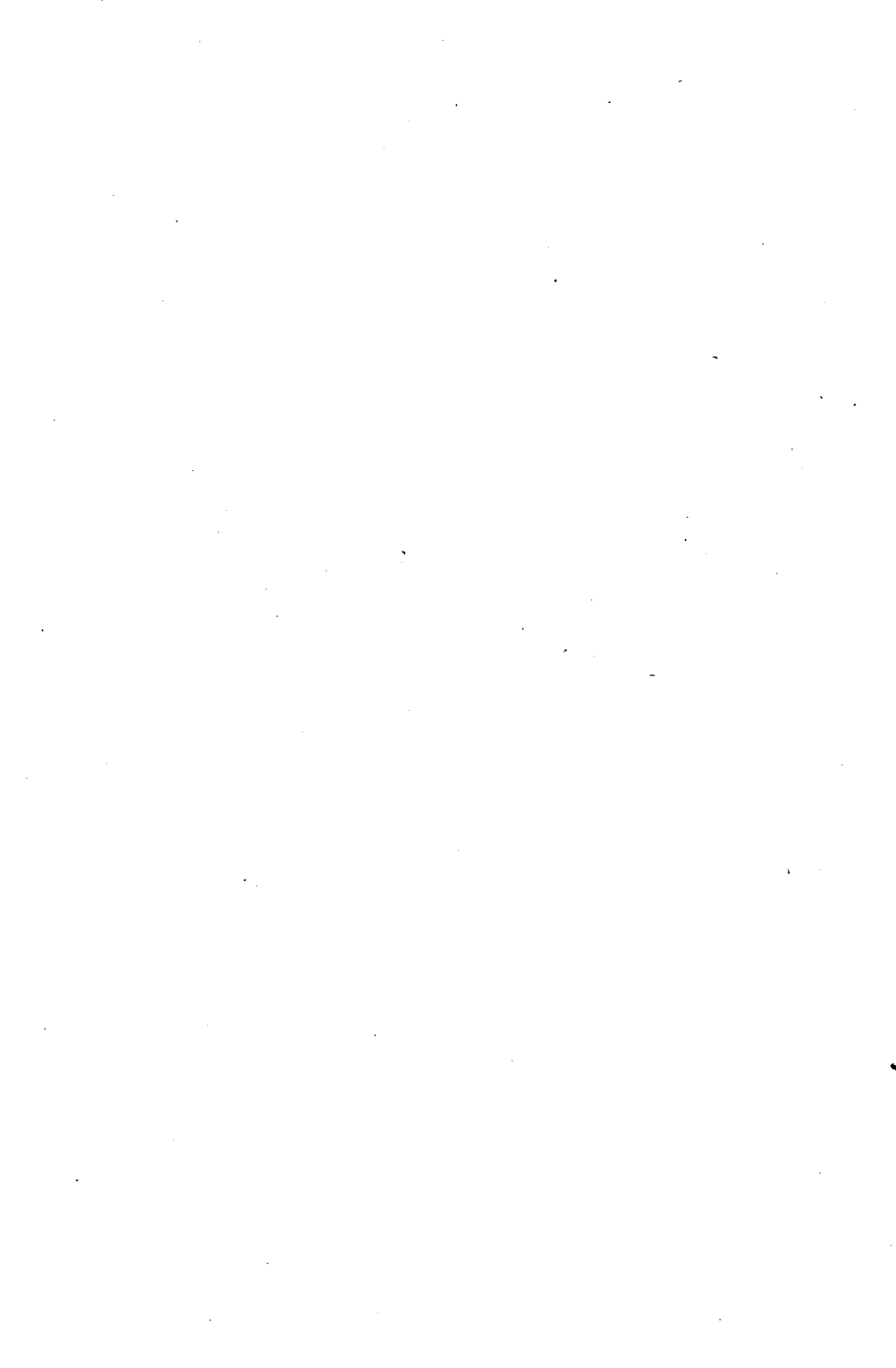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艺思潮

- 引 言.....(131)
- 七、非理性主义与当代小说叙事艺术.....(133)
- 八、新潮小说的审美趋向与现代派艺术观.....(149)
- 九、新潮小说对西方现代派小说创作方法的借鉴.....(194)

十、	中心的拆毁与当代中西小说叙事形态·····	(222)
十一、	文艺非意识形态论与非理性主义·····	(236)
十二、	反映论与文学的主体性论辩·····	(250)
十三、	文艺的本质特征与文艺的自律、他律关系·····	(263)
十四、	文艺本体论对反映论的碰撞与渗透·····	(278)
十五、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属社会批评”辩·····	(288)
十六、	中西文学活力探源·····	(307)
	后 记·····	(325)

上 编

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艺思潮



新文学引言

本编着重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在与世界文艺思潮认同过程中如何形成自身的特点。编中几章除了全面地辨析外国文艺思潮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渗透之外，还着重论述鲁迅小说的理性批判力度与外国文艺思潮的关系以及丁玲创作的独特性与外国文学的影响。虽然这些方面还未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外来影响的全貌，但是已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趋势，并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外国文学的借鉴。

虽然新文学先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但是新文学决非全盘西化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和旧文学对现代作家的潜在影响，已在他们的心灵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接受外来影响的过滤层。二者的碰撞与融汇导致原来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调整，它外化为具有新的艺术基质的文学体式。因此，勇于“接纳新潮，脱离旧套”，可以说已成为新文学所确立的多种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的接纳和创新，体现了对“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化内涵 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渗透

“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担负着思想启蒙与文学革新的双重任务。文学革命既是在新文化运动触发下产生的，又是新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任务导致审美意识的嬗变，从而引起文学观念、审美形式和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变革。反过来说，只有新的审美形式才适合表现新的内容、新的文化精神。“五四”新文学所肩负的双重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和“文学的解放”。而“人的觉醒”是“文学的觉醒”的前提和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批判封建传统文化，把人从封建伦常纲纪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本内涵，就是批判封建文学观，实现文学自身的解放，使文学真正成为“人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颇相似。尽管时代不同，国情不同，但是，“五四”文学革命者要完成新文学的双重使命，起初不能不引进西方的人道主义，以此为思想武器，向封建文化、封建文学发动进攻。这正如鲁迅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草鞋脚〉小引》）。这种人性解放的要求，正是对扼制人性发展、否定和贬低人的价值的封建伦理观的彻底反抗。

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之所以提出“人性的解放”要求，主要是压制了人民大众两千余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与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孳生的个人本位思想已不相适应。因此，文学革命者首先以人道主义为武器，扫荡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正宗儒家学说，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主要因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扼制了人性的发展，否定和贬低人的价值。首先，孔子提倡以礼为行为的规范。在儒学中，“礼”的广义是指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其狭义专指周代之礼。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之所以发生社会动乱，就是因为人欲横流，名分紊乱，要纠正这种时弊，就必须重建周礼的权威，用周礼来约束人们的一举一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同时，他非常强调“正名”，即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使人人都明白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控制自己的“欲”，不超出由“名分”规定的度量范围，从而消除争乱。以后，宋明理学家把孔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演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其次，孔子把“仁”作为儒家的思想核心。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最基本含义。孔子把“仁”看作是人的本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的道德的最高概括。有的论者根据孔子对仁的解释：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便认为儒家也有人道主义思想，这是对“爱人”的误解，混淆了中国家族本位的伦理型文化和西方个性本位的人文型文化的区别。实际上，“仁”和“礼”相关。儒学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把外在的等级制度、历史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整顿人的社会性（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一般、最亲爱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以国家同构精神推而广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从而扶宗法大厦之将倾。”^①再次，儒学主张以义为“礼”的规范和“仁”的价值准则。“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就是说，孔子不问某事是否有利，而只问合义不合义。合于义，便是真，是善，是美；不合义，便是伪，是恶，是丑。因此，后来儒家把“舍生取义”看作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本来孔子并没把义看成是与物欲（利）绝对对立的東西，二者之间不存在二律背反的关系，但经过孟子，特别是西汉董仲舒的推衍，义才成为与利水火不相容的价值准绳，义、利之辩也因此才成为中华民族人生价值观的一大纽结。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以义为价值准则的人生观的推衍。

以上简略探寻了儒家学说的要义，我们便明白“五四”时期新文化发难者何以要对儒学大张挞伐了。

在众多批孔的文章中，陈独秀的论文《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2月7日）颇值得注意。陈独秀用经济观念与伦理观念相一致的近代资产阶级意识来否定传统儒学：“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论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在他看来，儒家学说已不适应现代生活，理应抛弃。

和以上冷静的理性批判相对照的，是鲁迅和吴虞充满激愤之情的对礼教扼杀人性的控诉。鲁迅在他的那篇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开山之作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中，借“狂人”之口，道出惊世骇俗之言：

^①冯天喻等著：《中华文化史》（上）第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虞的文章《吃人与礼教》（《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1日）恰与鲁迅的小说相呼应：“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公然称呼封建时代的“至圣先师”孔子为“盗丘”，儒教儒学为“国愿”：

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①

因此，吴虞宣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②

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对儒学的批判，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对一派学术思想的褒贬臧否，“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文化传统的空前大否定，大扫荡。它继承了近代以来洪秀全、谭嗣同、章太炎的异端精神，并把它推演成波澜壮阔的思想新潮，磅礴于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当然，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也存在种种粗浅、偏颇之处。陈独秀、鲁迅、吴虞、易白沙等人此时掌握的武器，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文主义和个性主义。他们一般都只是用进化论而非历史唯物论来作为理论基点，而且又多表现强烈的全盘否定文化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掩盖这种批判砸碎精神枷锁，

①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

②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1917年6月1日《新青年》3卷4号。

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光辉。”^①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将对儒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固然和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有一脉相承之处，但由于他们站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又以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因此，他们对儒家的批判比历史上的反孔批儒显得更猛烈，更深刻。如果说，他们在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方面是“破”的话，那么，他们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启发下对自然人性的提倡和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可以说是他们对新的伦理观和文化观的建树。

“五四”新文学又可以说是以“人的觉醒”为前提和基础的。鲁迅当年的一段描述形象地勾勒了“人的觉醒”：

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般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②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一段话像是对鲁迅的那段描述的注解：“‘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这表明了“人”的发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一次历史性的改造和突破，人已经开始具有自尊和独立的价值，无须在纲常名教中寻找价值，因而不再是伦理等级网络中的一个无独立生命的存在物了。

那么，“人”的自尊和独立的价值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周作

^①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下）第1047页。

^②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人在《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一文中，首先对“人”作了解释。他认为“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着重点是原有的——引者）。前一层意思是指“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因此，“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后一层意思是指人有“内面生活”，也就是精神生活，因而人“比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唯其如此，凡是“兽性的余留”和“古代的礼法”等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都应该加以排斥改正”。他认为，上述两个方面归纳起来说，人具有“灵肉两重的生活”，人类的正当生活，便是“灵肉一致的生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辟人荒”，重新发现“人”，并且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周作人还解释说，他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并不是“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就是说，首先要“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周作人对“人”的解释，“是对‘人’的个体价值最充分的肯定。‘个体’不再消融在‘类’（或社会，或国家，或民族，或家族）之中，而作为实在的独立存在受到了尊重。此外在理论上也确立了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民族、国家、家族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并明确提出了‘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全新的伦理，既否定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也根本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屈己而利群’的伦理观。正是在这里，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彻底反封建性”。^①

^① 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对自身的认识》，《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第84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